

哲学没有标准答案

周国平



哲学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思考——在这个定义中，请注意两个关键词。其一，根本问题。哲学不只是方法论，如果你撇开根本问题，只是琢磨用什么聪明的方法去解决一些枝节问题，你就仍然与哲学无缘。其二，思考。哲学不是教条，如果你放弃独立思考，只是记诵一些现成的结论，你离哲学就比没有学这些教条的时候更远了。

哲学上的根本问题，比如世界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，原是没有最终答案的，更不存在所谓标准答案。如果有一种哲学宣称能给你一个标准答案，那一定是伪哲学。哲学的原义是爱智慧，什么是爱智慧？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过——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是最好的注解，就是绝不肯糊里糊涂地活，一定要想明白人生的道理。可是，教条式的哲学教学做的正是相反的事情，恰恰是要给你一个不思考的人生。

所以，我认为必须改革我们的哲学教学。哲学教材应该以问题为核心，辑录大哲学家们的相关著作，让年轻人知道人类最伟大的头脑在思考什么问题，有些什么不同的思路。通过这样的学习，唤醒你心中本来就存在的类似问题，使你对它们的思考保持在活跃和认真的状态。达到了这个效果，你就是真正进入了哲学。



贵妃醉酒图 (国画)

吴建平

每到春日新茶将上，总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期待。一是馋。喝了一冬的红茶、乌龙茶，想念新茶的鲜爽清香。二是有点相相似的期待，希望这次的茶好。

今年，三月中旬就看到了西湖龙井，还是一家比较正规的商行出品。传统的龙井是群体种，后来培育了要早十天到十五天的 43 号种。但据杭州家有茶园的朋友说，当时 43 号种还没开采。后来知道，为了赶早，杭州有些茶农，把 43 号改种乌牛早。想来我见的龙井是用杭产的乌牛早茶青做的。

应该说，这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西湖龙井了。不过，乌牛早也曾是一款不错的茶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复旦古籍所，一天大家说要喝新茶，于是做筵，章培恒先生抽到大头，一元五角，其余或一元或五角，我抽到跑腿，于是骑自行车到四川北路邮局对过那家茶行，六元五角购一两乌牛早。营业员再三强调，这是一两茶的价。当时，六元多买一两茶算是贵的。回来后，古籍所的人拿着茶杯串门，喜气洋洋。记得当时乌牛早喝后齿颊留香。

那天，茶友买了二两恩施玉露和一两头采着螺春。素不喜恩施玉露，以其口感上总有一丝倔强生硬，那天也是如此，而碧螺春佳。茶友说恩施玉露现场第一泡极佳，眼睛一亮，而碧螺春第一泡水温过低，后又高，未见佳。为此，还特意到茶城请女老板冲泡，结果那惊艳一泡没有再现，碧螺春倒是补了半斤。

卖碧螺春的那家有一小袋茶王茶，约三泡的量，是他们要来的，许诺和我们一起喝。我怕店家屏不住或好事茶客抢先，在纸袋上写“2017 年茶王茶”，再在上下封口处写上“骑缝是必须的”，方放心离去。路上，想起店家的村里有一口老井，在山脚下，大旱不涸，泡茶味佳，赶紧发微信，让回去取茶时汲点老井水来，泡茶王茶用。

喝茶，是一种日常需要，也可以是一种嗜欲，现在，更是一种风雅和高大上的爱好。不过对我来说，它只是通过味觉嗅觉视觉等使我愉悦的一种饮品。对于新茶的期待，有点像孩童向往糖果那样单纯。

喝酒有酒品，酒德，酒风，酒量之分，此文只讲酒量，而且只讲白酒的酒量。说起酒量，中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服气另一个地方的人，说内蒙古人能喝，东北人就笑了，说东北人能喝，山东人就笑了，说山东人能喝，河南人就笑了。据说以前说广东人不能喝，现在这么说，广东人也笑了。还据说中国人能喝，俄罗斯人就笑了。到底哪里的人能喝，至今并没有结论，因为世界上还缺少这种比赛，而且，世界度数最高的白酒既不产生于中国，也不产生于俄罗斯，而是波兰，高达 95 度。

我以前不喝酒，后来经常参加一些聚会，也学着喝点，曾经为了面子，拼过一次 3 个小时的晚宴，一斤二两五粮液，随后醉倒在地，再醒来是第二天的下午。这纪录自己再也无法超越。而一般情况下，那些号称很能喝的人，在两斤之后，也就都到桌子底下去了，比我强得有限。然而，在我的经历中，确实亲眼看到过三个酒量极大的人，关键是不醉，完全符合有酒不醉最为高的古训。

第一个是儿时的邻家叔叔，河北人，属燕赵之士，不过身材不算魁梧。他喝酒是用当时比较常见的大茶缸，装满大约是一斤半，喝起酒来如同喝水的感觉。有一次他到小杂货铺去买酒，刚好我在那里买盐，看到他掏出一块钱来打一斤半散装 60 度二锅头（当时散装二锅头 3 角 6 分钱一斤），售货员用木制酒提子给他打好酒，然后进到里屋找零钱，而

邻家叔叔端起大茶缸子，几乎一口气就喝光。不一会儿，售货员出来，给他零钱。他把大茶缸子递过去，说酒还没打。售货员摸摸脑袋，有些疑惑，无法确定是否给他打过酒。若是打

过，一斤半高度白酒在一分钟的时间里到哪里去了呢？当时，出于好玩心理，我没有揭发邻家叔叔，其实时至今日，我的人生中，还没有任何揭发他人的经历。售货员思索了一下，可能是觉得自己记错了，也可能是为了商店的声誉，还是又给他打一斤半二锅头。他美滋滋地端着大茶缸子出了门，掏出半根黄瓜作下酒菜，没到家门口，又喝光了。总量为三斤，毫无醉意醉态，估计再来一茶缸子也没问题。

第二个是我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时认识的上海女知青，某团团部广播员，典型的沪上女子，白白净净，身材苗条，说话柔声细气。有一年过春节，新来的团长一高兴，下命令谁都不许回家，坚持生产，过革命化节日，但杀猪宰鸡大会餐，以示慰劳。由于我被借调到团部批林批孔办公室，所以也参加了这次大会餐。而大会餐自然少不了酒，通常当地人喝的酒都是地瓜、苞谷、木薯酿制，20 多度，而河南籍的团长通过关系搞了一批河南产的白酒，绝对 50 度以上。广播员是美女，自然跟团领导一桌，我刚好在边上的另一桌。团长先发表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讲，郑重其事地敬了弟兄们一碗，然后

要把王国伟介绍给不认识他的朋友，或许只需一句话：他就是最早出版余秋雨《文化苦旅》并一手炒红这本书的出版人。这话会立刻激起对方的惊讶好奇，屡试不爽。是，后来成为顶级畅销书，并改变了余秋雨人生命运的《文化苦旅》，一开始在出版界倍受冷落。当年《文化苦旅》在《收获》杂志连载，文化圈读书界口碑甚佳，但要成书出版时却屡遇困境：不是遭误判为旅游指南之类小册子，就是被置入众多作家加盟的散文丛书。就在余秋雨对《文化苦旅》的出版不抱希望时，王国伟从他书房的墙角捡起了这堆废纸般的书稿：稿纸大小不一，有杂志的复印件，有用糍糊拼接的纸块，上面可见作者的修改手迹，也有原本要做旅游书的那家出版社涂抹得五颜六色的痕迹。

时任上海知识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的王国伟将书稿抱回办公室，找了个退休老编辑用稿纸工整誊抄一遍，只是这件事的开头。“精品图书是做出来的”。喜爱余秋雨文章，也对书稿的价值有准确判断的王国伟，在制作、出版、宣传、营销方面的谋划，步步精心步步为营，坚持数年，大获成功。当然，他和余秋雨都没料到，《文化苦旅》畅销了 20 多年，至今有多个版本在销售；余秋雨红遍世界华人地区，“余秋雨热”经久不衰。

我知道《文化苦旅》是王国伟近 30 年出版人生涯的最大亮点，也隐约了解他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出版界风云人物，他曾策划出版过许多畅销书和重要丛书，但读他的新书《我经历的 22 个出版事件》之前，并不清楚除了《文化苦旅》，中国女排功勋人物郎平也曾曾在多家出版社争抢中，选定他为《郎平自传》的

喝酒有酒品，酒德，酒风，酒量之分，此文只讲酒量，而且只讲白酒的酒量。说起酒量，中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服气另一个地方的人，说内蒙古人能喝，东北人就笑了，说东北人能喝，山东人就笑了，说山东人能喝，河南人就笑了。据说以前说广东人不能喝，现在这么说，广东人也笑了。还据说中国人能喝，俄罗斯人就笑了。到底哪里的人能喝，至今并没有结论，因为世界上还缺少这种比赛，而且，世界度数最高的白酒既不产生于中国，也不产生于俄罗斯，而是波兰，高达 95 度。

我以前不喝酒，后来经常参加一些聚会，也学着喝点，曾经为了面子，拼过一次 3 个小时的晚宴，一斤二两五粮液，随后醉倒在地，再醒来是第二天的下午。这纪录自己再也无法超越。而一般情况下，那些号称很能喝的人，在两斤之后，也就都到桌子底下去了，比我强得有限。然而，在我的经历中，确实亲眼看到过三个酒量极大的人，关键是不醉，完全符合有酒不醉最为高的古训。

第一个是儿时的邻家叔叔，河北人，属燕赵之士，不过身材不算魁梧。他喝酒是用当时比较常见的大茶缸，装满大约是一斤半，喝起酒来如同喝水的感觉。有一次他到小杂货铺去买酒，刚好我在那里买盐，看到他掏出一块钱来打一斤半散装 60 度二锅头（当时散装二锅头 3 角 6 分钱一斤），售货员用木制酒提子给他打好酒，然后进到里屋找零钱，而

邻家叔叔端起大茶缸子，几乎一口气就喝光。不一会儿，售货员出来，给他零钱。他把大茶缸子递过去，说酒还没打。售货员摸摸脑袋，有些疑惑，无法确定是否给他打过酒。若是打

过，一斤半高度白酒在一分钟的时间里到哪里去了呢？当时，出于好玩心理，我没有揭发邻家叔叔，其实时至今日，我的人生中，还没有任何揭发他人的经历。售货员思索了一下，可能是觉得自己记错了，也可能是为了商店的声誉，还是又给他打一斤半二锅头。他美滋滋地端着大茶缸子出了门，掏出半根黄瓜作下酒菜，没到家门口，又喝光了。总量为三斤，毫无醉意醉态，估计再来一茶缸子也没问题。

第二个是我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时认识的上海女知青，某团团部广播员，典型的沪上女子，白白净净，身材苗条，说话柔声细气。有一年过春节，新来的团长一高兴，下命令谁都不许回家，坚持生产，过革命化节日，但杀猪宰鸡大会餐，以示慰劳。由于我被借调到团部批林批孔办公室，所以也参加了这次大会餐。而大会餐自然少不了酒，通常当地人喝的酒都是地瓜、苞谷、木薯酿制，20 多度，而河南籍的团长通过关系搞了一批河南产的白酒，绝对 50 度以上。广播员是美女，自然跟团领导一桌，我刚好在边上的另一桌。团长先发表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讲，郑重其事地敬了弟兄们一碗，然后

要把王国伟介绍给不认识他的朋友，或许只需一句话：他就是最早出版余秋雨《文化苦旅》并一手炒红这本书的出版人。这话会立刻激起对方的惊讶好奇，屡试不爽。是，后来成为顶级畅销书，并改变了余秋雨人生命运的《文化苦旅》，一开始在出版界倍受冷落。当年《文化苦旅》在《收获》杂志连载，文化圈读书界口碑甚佳，但要成书出版时却屡遇困境：不是遭误判为旅游指南之类小册子，就是被置入众多作家加盟的散文丛书。就在余秋雨对《文化苦旅》的出版不抱希望时，王国伟从他书房的墙角捡起了这堆废纸般的书稿：稿纸大小不一，有杂志的复印件，有用糍糊拼接的纸块，上面可见作者的修改手迹，也有原本要做旅游书的那家出版社涂抹得五颜六色的痕迹。

时任上海知识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的王国伟将书稿抱回办公室，找了个退休老编辑用稿纸工整誊抄一遍，只是这件事的开头。“精品图书是做出来的”。喜爱余秋雨文章，也对书稿的价值有准确判断的王国伟，在制作、出版、宣传、营销方面的谋划，步步精心步步为营，坚持数年，大获成功。当然，他和余秋雨都没料到，《文化苦旅》畅销了 20 多年，至今有多个版本在销售；余秋雨红遍世界华人地区，“余秋雨热”经久不衰。

我知道《文化苦旅》是王国伟近 30 年出版人生涯的最大亮点，也隐约了解他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出版界风云人物，他曾策划出版过许多畅销书和重要丛书，但读他的新书《我经历的 22 个出版事件》之前，并不清楚除了《文化苦旅》，中国女排功勋人物郎平也曾曾在多家出版社争抢中，选定他为《郎平自传》的



就让广播员敬他这个主管一碗。所谓碗，其实是割胶时挂在橡胶树上接胶水用的烧瓷容器，装满了半斤多。广播员很老实，团长说干杯，她就一口喝干。政委一看，说也要敬自己一杯，于是广播员又干了一碗。可能认为这广播员有酒量，或者是想把地灌醉看笑话，副团长、副政委、参谋长、政治处主任等四人，接连要求敬他们，否则就是看不起他们这些副职干部，因而广播员又继续干了四碗。同桌的副参谋长和政治处副主任

也不甘落后，提出同样要求，广播员就又喝了两碗。眼见四斤高度白酒下肚，广播员脸不变色心不跳，边上的首长们面面相觑，沉默了一下，顿时鼓起掌来。

第三个是偶遇的一个东北小伙子，接待办副主任，矮小干瘦，见谁都点头哈腰。我是跟一公司总经理到东北某地区考察投资环境的，对方请客，山珍满桌，有几道菜闻所未闻。每人面前一个饭碗，灌满 58 度的东北烧酒，也是最少半斤。州长欢迎迎过后，这个接待办副主任进来。先客气地向带我来的总经理问他的基本个人情况，然后沉思数秒，张口用当时流行歌的曲子，填进阿谀奉承总经理之词，很专业

出版人，郎平的理由非常简单：信任 and 缘分；雅皮经典代言人张耀风靡一时的《打开咖啡馆的门》和《咖啡地图》，亦是经他之手问世，开创了出版界大视觉图书的先河；而中国学术界、文学界许多优秀学者和作家，前者如刘小枫、蔡翔、鲁枢元、南帆、张志扬、徐友渔、陈家琪、孙周兴、鲁萌萌等，后者如柯灵、张承志、张炜、周涛、张洁、张抗抗、慕容、韩少功、铁凝等，都是他那些或成功或流产的“出版事件”的共同演绎人。

文化感受能力好、思路清晰、执行能力也强的国伟，和我聊过他为什么选择做出版这行。如出版人王为松所说，出版人首先都是书迷书痴。但爱书人也可有多种职业选择。上世纪 80 年代是我们这代人怀念的好时代，“文革”结束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，促成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发展和思想交流。只要有眼力和沟通能力，就总能和优秀的思想者群体为伍，而这个职业过程充满思辨和审美，对个人而言也是一种修炼。

国伟和我谈论过他独特的“一本书主义”。他坚信优秀作者总有一本最好的书，他做出版的自我要求就是发现这样的一本书，并以适合的方式出版营销。而这一本书一定代表这个学者和作家的创造精华、写作高峰。他 1984 年 28 岁入行，21 世纪初离开出版社转任中国银联的期刊总编辑和公司文化总监，从事新媒体和数据库媒体的实践，曾让许多朋友不解和惋惜。经历身份裂变后他再次更换跑道，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任教授，满足于治学育人。

时代远去了，青春的体温并未褪尽。“却顺所来径，苍苍横翠微。”只是，心头依然会热。

戏边草（四首） 肖复兴

杜十娘

古渡瓜洲旧戏场，可曾老浪迎新妆。梦回未动一江月，泪罢难沉百宝箱。欲满美人床上卧，钱多高士酒中狂。而今李甲满船走，何处犹寻杜十娘。

西厢记

百年谁又读西厢，普救寺中传旧腔。未见青云沉弱水，犹闻红粉过残墙。孤花待月看晴雨，独雁凭风度暖凉。微信而今传万里，相思何必拜红娘。

白蛇传

一听老戏总缠绵，草长莺飞几百年。花远重重山外树，云轻淡淡梦中烟。舞衣已落情湖里，歌扇还投法海前。伞破虽能记忆忆，断桥难再遇蛇仙。

牡丹亭

牡丹亭外雨潺潺，姹紫嫣红一瞬间。折子戏吹风彻骨，断肠篇落雪盈山。尘情萧瑟消清梦，心事苍茫逝远关。世上难分人鬼兽，无多幻想要全删。

地演唱起来，唱罢，自己先一口喝光，客人面对盛情，也只好一饮而尽。随即，副主任打探第二个客人情况，换一首歌曲，填入新词，真诚祝福，再喝干一碗。那桌酒席包括州长在內，共 12 人，副主任唱了 12 首流行歌曲，喝了 12 碗白酒，起码 6 斤，而且一口菜不吃，面带微笑，毫不摇晃地弯腰退出。

时至今日，我早已阅尽人间脸色，混过无数酒

父亲的掌勺功夫确实不赖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如果家里有一桌丰盛的菜肴，不是逢着大事，就是大过年那天了。那时，爸爸就把功夫用上了，拿手菜一一亮相。红烧狮子头就是一绝。

父亲或母亲上菜市挑选的肉材，肥瘦恰如其分。然后剁碎，拌以葱姜之类，蒜末则不在此类，我们家皆为南方人，似乎与大蒜不太搭界，家里鲜见。和做蛋饺的内馅也有类似，切得碎而不干，转成一个比乒乓球大些的肉丸子，松软而不散。放入油锅里煎炸，那是父亲亲自把握的，待油水金黄，肉香扑鼻，肉丸子表皮深红而不起焦，便捞出油锅，再往锅里略加清水酱油煮熟，稍加些味精调料之类，差不多半小时多些，便可出锅装盘了，一个个敦敦实实的，滚圆饱满，令人垂涎欲滴。

咬上一口，嘴上油而不腻，狮子头外表色香，内稍淡，不咸不淡，软硬可口，有点嚼劲，更是刺激了牙神经，进而也更激发了味蕾。我一口气可以吃上四五只，吃了之后，意犹未尽。

好在过年时父亲做了几十只狮子头，做成半成品，煮熟了，搁在两只超大的碗盘里，以后每餐夹出若干，加上蔬菜，煮熟了，便端上了桌，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一桌的主菜，骄傲地圆满着。

我曾猜想这狮子头名称的来历，似乎形似多些。后来再联想，发觉狮子头本身要比那些肉丸子之类更显傲气，表面和内里都有一种狮子大王般的豪气、霸气，在餐桌上一露面，在各种菜肴之中，就显示出某种不凡，因此也更引人注目。同时，我也发现，能做狮子头的人，都会为拥有此招而骄傲。汪曾祺先生曾撰文提及，周恩来总理是淮安人，会做狮子头，曾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做过一次，他对大伙说：“多年不做了，来来来，尝一尝。”汪老评说道：“想必做得很成功，因为语气中流露出一得意！”政治大家尚且如此，作为一位持家的老劳模，父亲自然也是乐在其中，也是为此感到自豪的，家人亲朋都对这狮子头欲罢不能，赞不绝口，这也确实值得骄傲的。

上世纪改革开放后，日子好了些，父亲做狮子头的机会愈来愈多了，每逢节假日，都能品尝到这一美食，即便因为减肥等对猪肉入口开始有所顾忌，但这狮子头一上桌，男女老少还是禁不住伸出了手中的筷子。

父亲辞世了。再也不可能享受他的狮子头了。外面饭店、单位食堂的狮子头，我也几乎不再触碰。幸亏母亲、姐姐也曾跟着父亲学了一些，有时过节，她们也会在家悉心地制作和烹饪，味儿也不错。只是我时常十分怀念那入口有味的狮子头，也特别想念在天堂的父亲。

公公和婆婆的两地书，明请家的烙印 看本栏。

爸爸的狮子头

安凉

